

自然的。」當爲序言。「自然」也許就是七等生一再強調的「文句節奏的特徵，完全可以代表作家作品的生命。」但是「削瘦的靈魂」的七等生，並不是那麼一回事。如果七等生能够保持過去作品的水準風格，相信這部自剖式的作品，會讓人有耳目一新的異樣感覺。可惜他因憤怒而沉不住氣，使得「削瘦的靈魂」的畫面，沒有以往的潔淨，而近乎醜陋。七等生似乎永遠不會忘懷人家誇獎他的一句話：「武雄，你很有性格。」於是他一面再、再而三的重複自己如何擁有藝術家的氣質，如何不見容於「庸俗」的社會，而苛責他的老師、學校、社會和羣衆，有些污辱謾罵又都是意氣的「人身攻擊」。七等生不深思「一個教師有權教他認爲最有價值的東西給他的學生」，反而認爲現行的教育制度都是不合理，且肯定是妨礙一個藝術家成長的絆腳石。殊不知各種教育制度都有其本質和功能，就像師範教育，就有培養健全優秀的師資的本質和功能。七等生不從大處著眼，而專就一些細節挑剔、渲染，使得整部「削瘦的靈魂」幾乎都是夫子自道的文字。七等生難道不知道，一個人如果離開老師、學校、社會和羣衆，豈不就變成「隱遁者」魯道夫

那種角色？一個人除非孤芳自賞，閉封在自己編織的象牙塔，否則魯道夫那種人物是不存在的。

七等生既說「沉默代表一種最廣度的諒解。」也希望「所有人間的美名和權益都分給人們，只留下給我平靜。」爲什麼又不憚其煩，絮絮不休訴說那些無謂的牢騷，而踐踏他的才華呢？（瑩瑩）

## 搖滾之樂樂如何

談「熱門之圈」·陶曉清著

民國六十五年七月·書評書目社出版

搖滾樂在歐美經過二十多年以來的掙扎與成長，到了目前已茁壯得足以和承繼古典音樂傳統的現代音樂相庭抗禮，同爲廿世紀音樂的兩大主流。這一點，相信是有目共睹的事實。但是在此地，我們卻因爲擔負着音樂傳播重任的電臺主持人，多年以來不斷地以「錢櫃雜誌」及「票房雜誌」的排行來決定一首歌曲的成就或地位，因此造成了此地許多人對於搖滾樂的錯誤觀念，甚至抱著蔑視的態度。也所以在搖滾樂

的定義還沒有獲得統一或者釐清之前，任何有關這方面的爭論都祇是徒增紛擾而已。

我以為搖滾樂之地位所以被肯定的理由，除了它具備豐腴的音樂形式之外，就如前人所說：「搖滾樂是一種生活的態度。」每一個誠摯的搖滾歌手都可以通過他的音樂，向他的追隨者吟唱他對現代生活的感受，對未來世界的憧憬；有的歌頌塵世間的七情六慾，有的抗議社會的不平，甚至有的就在音樂中表露他對外太空人的恐懼。所以這些搖滾歌手間的稱呼，早就不用「歌手」或者「歌星」(Singer)這類不夠「精確」的字眼，而用「Artist(藝術家)」這個字，表示他們對於自己作品的嚴肅態度。像 Rolling Stones 十幾年來不斷地吸收新的音樂形式，賦予新的節奏與色彩；Rick Wakeman 的作品往往長四十分鐘，卻祇是從一個巴哈或者古老英國聖歌的主題動機發展而來；Pink Floyd 則對於電子音樂的拓展不遺餘力。至於 Bob Dylan, Cat Stevens, Van Morrison 這些搖滾樂的「超級巨星」，張照堂曾作過一系列的論文，發表在「音樂與音響」雜誌，此地亦不加贅述。祇是：他們這些人的努力和成就，不

應在此地就被商業性質的所謂「排行」來抹煞，這樣不是一種「生活態度」。

從這裏來看，我們很高興有陶曉清著「熱門之窗」的付梓印行，它是我國第一本肯定的搖滾樂成就的論著。從書的內容而言，它也的確完成了一扇窗的功用，能够使一般聽慣了「熱門音樂」的讀者，直窺搖滾的堂奧。相信對於主持了「暢銷音樂」十年的陶曉清來說，是件相當艱鉅的工作。因為「熱門之窗」一書是從流行音樂出發，從一九二〇年的 Paul White Man 這種老掉牙的陳舊歷史，一直寫到搖滾樂的前衛人物 Frank Zappa，簡直就是一部搖滾樂從成長到茁壯的「辛酸史」或「浮沉錄」。當然，在這樣的一部大書裏，作者陶曉清也難免有時犯了迷失方向的錯誤，讓人分不清哪些是追求「排名一〇〇」的歌星，哪些又是嚴肅的搖滾「藝術家」？大致說來，「熱門之窗」一書的分類及其類目下的歌手，這種安排還很恰當，所以是值得信賴的搖滾入門。

總之，披頭四的歲月是已經過去了，搖滾樂目前所需要的不是明星，而是誠摯的藝術家鍥而不捨的努力，以及更多的同情（溝通），正如 Bob Dylan 所

唱出的··

How does it feel? How does it feel?

(要如何去感受?)

To be on your own.

(就你自己。)

——“Like A Rolling Stone”

(安大略)

## 換湯換錯藥

看「嚴子與妻」·曉風著

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連載

每到十月、十一月間，我們就知道又快要到曉風的劇本了。因為根據過去幾年的經驗，曉風劇本的「定期」出現，已經建立起一種候鳥式的「一年一度」的印象。在很多作家以「愛惜羽毛」為藉口而很少有新作的時候，曉風能不計作品好壞，每年「照例」推出一齣新戲，這種「執着」的態度，應該是很值得欽佩的。不過，正如候鳥每年飛來時，只讓人想到「又

來了」一樣，我們看見曉風的「年度戲劇作品」，也只有「又來了」的感覺，因為年年飛來的候鳥總是那幾類的，而曉風的作品也同樣一直跳不出舊有的窠臼。

也許正因為如此，才更增加了讀者和觀眾每年的期盼，希望能意外地看到曉風有不同於「例作」的新獻，而得到一份驚喜。不幸的是，年復一年，我們都還無福獲得這份驚喜之感，今年仍不例外。

曾有人覺得曉風劇本最大的缺失在「文以載『教』」，這個說法很有意思，套一句很「現代」的文學批評術語來說，這個說法也很「準確」，因為那個「教」字，但凡是對曉風作品略有認識的人，都一看便知是「宗教」之「教」；不像說她的作品「文以載『道』」，還得特別標明這個「道」字是「佈道」之「道」。不過說這是曉風劇本的「缺失」，却未免失之於不够公平。因為作者對主題的選擇和劇本的好壞並沒有多大的影響。

我們之所以說「不够」公平，而沒有說「很不」公平是因為曉風的劇本之所以一直是「西望長安——不見家（佳）」，無可否認的，「爲了遷就宗教思想」是主要的原因之一。